



文化荆州

二〇二六年第十八期 总第二百零九期
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

文武之道 今夜尽矣

——江陵焚书一千四百七十一年祭

□ 张卫平

公元554年冬，西魏大军兵临江陵城下。这座号称“铁打”的古城，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城内，梁元帝萧绎，既没有组织最后的抵抗，也没有考虑突围的路线，而是躲进东阁竹殿，面对满架的图书，放声大哭。

随后，萧绎命令舍人高善宝，将“国家图书馆”里14万卷藏书，付之一炬。在西魏官兵攻城的呐喊声中，皇宫里燃起的大火，映红了江陵城的夜空，中国南方半数以上的传世古籍化为灰烬。对此，历史学家葛剑雄先生说：“由皇帝主动焚毁十四万卷书的记录，在这二千多年间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江陵焚书的惨烈，首先在于那14万卷图书的分量。这不是普通的藏书，而是自秦始皇焚书以来，历经数百年的劫难，一代代学者们艰难积聚的文化命脉。《隋书·经籍志》里，详细地记载了这批图书的来历。秦始皇焚书坑儒，规定以吏为师，民间藏书荡然无存。汉惠帝解除禁令后，学者们靠着口耳相传，勉力恢复典籍。汉武帝设置太史公收藏天下图书，司马迁父子便是依此写就《史记》。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校阅整理，编成《七略》，著录图书三万三千九百十卷。王莽覆灭时，宫中图书被焚。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重开书府，又聚起一批典籍。董卓西迁长安，军人将缙帛书卷当作帐幕包袱，七十余车藏书毁于战火。魏晋之际，图书稍复，又遭八王之乱、永嘉之祸，洛阳化为废墟，皇家藏书荡然无存。东晋偏安江南，慢慢搜集，至宋元嘉八年，得书六万四千余卷。齐末战火再起，图书又遭损失。梁武帝重视文化，江南维持了四十余年安定，文德殿藏书达二万三千余卷。侯景之乱平定后，梁元帝将建康文德殿及公私藏书七万余卷运回江陵，加上他在各地任上收罗的七万卷，总计十四万卷。每一卷书，都是劫后余生的幸存者。每一卷书，都凝结着历代学者抄写、校勘的心血。在那个印刷术尚未发明的时代，图书全靠手工抄写，许多都是孤本。“烧掉一卷书，世界上便绝迹一卷”。隋代秘书监牛弘将江陵焚书列为中国书籍的“五厄”之一，与秦始皇焚书并列。但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秦始皇焚书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有选择地销毁；梁元帝焚书，则是纯粹的毁灭，不分青红皂白，不辨经史子集，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有道是，书痴竟成焚书者，帝王原是毁文人。梁元帝萧绎，本不该是焚书之人。他爱书，爱读书，爱到骨子里。据《梁书·元帝纪》记载，他五岁便能背诵《曲礼》上半部。自幼瞎了一只眼睛，却异常好学，“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他为皇子时，先后在会稽、建康、江州、荆州任职，每到一处，必搜罗图书，最终积至七万卷。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记下一则元帝亲口讲述的故事：“昔在会稽，年始十二，便已好学。时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闲斋张葛帷，独坐，银瓶贮山阴甜酒，时复进之，以自宽解。率意自读史书，一日二十卷。”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浑身疥疮，蜷缩在葛帐中，忍着痛楚一日读二十卷书——这画面无论如何也与后来那个焚书者联系不起来。他还是一位著述宏富的学者皇帝。据史载，他著有《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汉书注》一百五十卷、《周易讲疏》十卷、《老子

讲疏》四卷、《金楼子》十卷，以及文集五十卷，总计超过四百卷。如此广博的学术成果，即使放在专业学者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他甚至在兵临城下时，还在给大臣们讲解《老子》。《资治通鉴》记载，554年10月19日，元帝在龙光殿讲《老子》，11月23日魏军抵达襄阳，他才暂停讲课，宣布“内外戒严”。四天后见魏军没有动作，又恢复讲课，百官只得穿着军装听讲。这是怎样的书生皇帝！他痴迷书本，醉心讲学，仿佛那城外的铁骑与他无关，仿佛那即将倾覆的江山只是书中的一页。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南朝》诗中写道：“地悠悠天悠悠，金陵王气应流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虽未直言元帝，却道出了南朝末世那种病态的精致与荒唐。

11月27日，魏军渡过汉水，截断江陵以东长江水路。12月27日夜，江陵城已被重重包围。元帝上城巡视，居然还雅兴不减，随口作诗，群臣奉和。他始终不相信自己会败。或者说，他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败。据《南史·梁本纪下》记载，城破前夕，元帝“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他还要赴火自焚，被宫人左右阻止。又以所佩宝剑斩柱，柱折，长叹一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那一刻，在他眼中，十四万册书与一把宝剑，都是他的私有财产。有用时取用，无用或不可得时，便毁掉它。书是他搜罗的，剑是他佩带的，国家是他坐的——既然都要失去，不如亲手毁掉。他后来被俘，西魏将领问他为何焚书，他的回答令人震惊：“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把亡国的责任，归咎于读书。把败亡的耻辱，迁怒于书籍。南宋史学家胡三省读到这里，愤然批注：“帝之亡国，固不由读书也。”

一把烈火焚书卷，千古骂名付笑谈。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写下了著名的《论梁元帝读书》，对萧绎的焚书进行了深刻剖析。他说：“取帝之所撰著而观之，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者，非破万卷而不能。然而所取者，华藻之文，非大雅之正也。”意思是，萧绎读书著述，不过是追求辞藻的华丽、典故的繁复，用来夸耀自己的博学，从未领会书中的大义，更从未将书中道理用于治国理政。王夫之进一步指出，梁元帝之亡，并非读书之过，而是读书不得其法之过：“志定而学乃益。未闻无志而以学为者也。心不定，则所学者杂而不醇，异端邪说，流俗小智，乘间而入，大则蚀其心，小则荒其目。此元帝之所以迷而至此，至死而不悟也。”没有确立志向，读书再多也不过是知识的堆砌，反而可能误入歧途，自以为是的，刚愎自用。

江陵城破后，西魏军队“虏其男女十余万人，收其府库珍宝”。得到赦免的只有三百余家，其余老弱幼小尽数被杀，寒地冻中，二三人沿途冻死或被踩死。更令人唏嘘的是，在焚书的熊熊大火中，自诩读书人代表的萧绎大呼“读书无用，文化已死”，但征服者却恰恰看重这些。据记载，西魏将领于谨、杨思等“掘拾遗逸，凡四千卷，将归长安”。颜之推在《观我生赋》自注中写道：“北于坟籍少于江东三分之一，梁氏剥乱，散逸湮亡。唯孝元鸿合，通重十余万，史籍以来，未之有也。兵败悉焚之，海内无复书府。”海内再无书府——这是怎样沉痛的句子。颜之推本人就是这场浩劫的亲历者。他

曾在梁元帝手下为官，亲眼目睹江陵陷落，后被掳往北方。他在《颜氏家训》中写道：“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那些在南方世代代平民的人，仅仅因为读过书、有文化，到了北方就受人尊敬。讽刺的是，在焚书者眼中毫无用处的书本，在“蛮族”统治者眼中却是珍宝；在自诩文明正统的江陵城中被付之一炬的典籍，在北方的朝堂上却被小心收存。

1470年过去了。江陵焚书的烟尘早已散尽，但是，这场文化浩劫留给后人的思考，却从未停止。梁元帝焚书，固然是个人的疯狂，但也是历史的必然。正如葛剑雄先生所说：“历史的悲剧也正发生在皇帝身上。一旦图书为皇帝所收藏，就成了他个人的私产，不仅从此与民间绝缘，而且随时有被篡改或销毁的可能，也会成为一位皇帝或一个朝代的殉葬品。”在专制制度下，一切都属于皇帝：土地是皇帝的，百姓是皇帝的，文化自然也是皇帝的。他可以聚天下图书于一室，就可以一把火将它们化为灰烬。他可以让学术繁荣一时，就可以让文化万马齐喑。萧绎不过是这种制度的极端体现者——当他认为自己拥有绝对处置权时，毁灭便与创造一样理所当然。葛剑雄先生还曾痛切地指出：“本应属于全体公民所有的文化遗产实际为个别特权人物所占有的现象，在辛亥革命后还是屡见不鲜。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康生之流还拥有大批珍贵文物。”封建制度覆灭了，但那时将文化视为私产的观念，却从未绝迹。

梁元帝死前，以宝剑斩柱，长叹“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他不知道，文武之道，不在14万卷书中，更不在他所佩的宝剑上；而在万千读书人的心中，在代代相传的文脉里。书可以焚，柱可以断，人可以被杀，但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文化就不会断绝。颜之推被掳往北方，却写下了《颜氏家训》；庾信滞留北国，却写下了《哀江南赋》。他们就是未灭的火种。王夫之在评点江陵焚书时，写下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书何为者哉？非以博闻也，非以辩也，非以悦耳目也，非以矜所长也。”读书，既不是为了炫耀博学，也不是为了辞藻华美，而是为了明白事理、修己治人。梁元帝读书万卷而亡国，不是读书的错，而是他从未真正读懂书。

今夜，漫步在梁元帝当年后花园东苑旧址盆景园里，遥想当年那场大火。14万卷书化作灰烬，随风飘散在长江上空。但文化的江河，终究不会因一场大火而断流。只是，每当我们拾起一卷残存的古籍，每当面对某段缺失的历史，都该想起那个寒夜，想起那声叹息——

“文武之道，今夜尽矣。”
这叹息，是警示，也是鞭策。

- #### 参考文献
- 葛剑雄：《江陵焚书一千四百四十周年祭》，载《往事和近事》，三联书店2007年版
 - 魏征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
 - 李延寿：《南史·梁本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
 -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
 -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
 - 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

简说楚文化④

跌宕多姿的楚国历史(三)

第四节 臻于盛世

战国前期，楚悼王任用吴起推行变法，虽然未能取得完全成功，但变法在短期内对楚国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战国中期，楚宣王、威王在统治期间，一方面休兵息民，保持实力，不轻易出击；另一方面则洞察形势，抓住有利时机，攻城略地，开拓疆域，使楚国出现了战国时期最鼎盛的局面。

一、吴起变法

战国前期，楚国面临着国内外多重压力。一方面，魏国等强国的崛起对楚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另一方面，楚国国内社会矛盾尖锐，旧贵族势力庞大，国家财政困难，军队战斗力下降。为了摆脱困境，楚悼王于公元前382年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

吴起，卫国人，战国初期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早年在魏国为官，因被魏武侯猜疑，转投楚国。吴起在楚国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旨在打击旧贵族势力，加强军队建设，富国强兵。吴起的改革尽管遭到了楚国旧贵族势力的极力反对，但在楚悼王的支持下，仍然推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措施。

吴起变法的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废除世卿世禄制，减轻国民负担；其二，裁减冗官，提高效率；其三，明法审令，实行法治；其四，整顿吏治，改善社会风气；其五，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队战斗力；其六，开发边远地区，发展社会经济。吴起变法仅持续了一年时间，就因为楚悼王之死戛然而止。公元前381年，大力支持吴起变法的楚悼王离世，那些对变法怀有刻骨仇恨的旧贵族势力开始蠢蠢欲动，联合起来追杀吴起。吴起逃到楚悼王的灵堂之上，将身体趴在悼王的尸体上，试图让旧贵族停止追杀。因为楚国法律规定，“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吕氏春秋·贵卒》）。谁要敢对君王的尸体动手，就是犯了重罪，是要被株连三族的。但旧贵族们并未因此罢休，用弓箭将吴起射死，将其尸体车裂肢解，而楚悼王的尸体也被乱箭射中。楚悼王的儿子楚肃王继位后，以旧贵族触犯楚国法律，以兵器加害于悼王的尸体为由，将七十多家参与动乱的贵族全部灭族。

吴起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在楚国政治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对楚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吴起变法大大削弱了楚国旧贵族的势力，极大地减轻了楚国政治与经济上的压力。由此，楚国国力得到增强，领土进一步扩大，“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为后来的“宣威之治”创造了条件。

二、灭蔡伐鲁

楚肃王执政11年，身后未留下子嗣，其胞弟熊良夫继位，即楚宣王。楚宣王于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340年在

位。楚宣王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善于用人，洞察形势，抓住有利时机开疆拓土，使楚国成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大国。

楚宣王在位时，楚国国力强大，让北方各诸侯国十分畏惧。据《战国策·楚策》载，楚宣王有一次问群臣：北方诸侯为什么那样惧怕楚国的令尹昭奚恤？大臣江乙先是讲了一个“狐假虎威”的寓言故事，然后说：“当今楚王拥有楚国方圆五千里的疆域，拥有雄兵百万，全都交给昭奚恤一人统管，北方各国哪里是畏惧昭奚恤呢，其实是畏惧楚王，这就像狐假虎威那个故事里讲的那只真正害怕的是老虎一样。”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当时楚国国力的强大。

楚宣王审时度势，向周边扩张领土，使楚国国土向北到达齐、鲁边境，向西与秦国相邻。楚宣王为扩展地域，兼秦、魏激战之机，沿汉水西上，将势力伸入巴蜀地区，故《淮南子·兵略》说楚“西包巴蜀”。

公元前343年，楚宣王发兵攻打蔡国，将蔡侯徙徙回楚国郢都。楚宣王发兵灭蔡，起因是蔡侯倒向魏国，背叛了楚国。但楚宣王为灭掉蔡国找的理由，竟是因为蔡国两个大臣的名字取得不好。蔡国派遣两名使者前来楚国朝拜，这两名使者一个名叫“师强”，另一个名叫“王坚”。从字面上看，“师强”有“军力强大”之意；“王坚”有“国君坚强”之意。以“师强”“王坚”作为人名，本无可厚非，但楚宣王听说这件事后，很好奇地说：“人起名字是要表达一定的用意的，为什么偏要起‘师强’‘王坚’这样的名字呢？”于是当即召见两位蔡国使者。

楚宣王见到师强、王坚，仔细打量这两人，发现这两人不仅声音很难听，长相也奇丑。楚宣王大怒道：“蔡国是不是故意派师强、王坚来楚国，向我们表示他们不再臣服于楚国了，以此来试探我们的实力？如果是这样的话，蔡国应受到讨伐。”于是派兵攻打蔡国。楚军旗开得胜，大败蔡国后，将蔡侯带到楚国，楚宣王到郢都城外亲自迎接大驾凯旋。

为了显示国力强大，楚宣王在楚郢都纪南城盟会诸侯。各诸侯王都准时到达会场，唯有鲁共公迟迟不到，这让楚宣王大为不悦。

鲁共公到达会场后，还带来了几坛鲁酒进贡给楚王。楚宣王品尝鲁酒时，发现酒味十分寡淡，恼怒地说：“如此劣酒也敢进贡给本王，是何居心？”鲁共公不甘在诸侯面前受辱，竟敢离开会场，扬长而去。楚宣王大怒，与齐国共同发兵讨伐鲁国。

魏国的梁惠王一直想进攻楚国，因担心楚国会出手救援楚国而迟迟不敢出兵。现在楚国发兵攻打鲁国，自顾不暇，所以魏国就放心地发兵围困了魏国的都城邯郸。后来人们就用“鲁酒薄而邯郸围”这三个典故指无端受到牵连或累及无辜。

三、破齐败越

公元前340年，楚宣王卒，其子熊商继位为王，是为楚威

王。楚威王于公元前339年至公元前329年在位。虽然在位时间不是很长，但楚威王却是战国时期楚国最有作为的君王，他在位期间，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战国时期的顶峰。

公元前334年，魏惠王率领韩国和一些小国前往徐州（今山东滕州东南）朝见齐威王。在这次会盟中，魏惠王与齐威王订立同盟条约，相互尊对方为王，史称“徐州相王”。这一事件标志着魏国和齐国在外交上的一次重大合作，也引发了后来各国纷纷称王的连锁反应。

徐州相王后，楚国在诸侯国中的独特地位受到挑战，楚威王对此愤怒至极，以至“寝不寐，食不饱”（《战国策·秦策》）。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亲自统率大军，对齐国发动进攻。齐国任命申缚为主将，调集军队进行防御。楚军大败齐军，俘虏了齐国主将申缚，史称“徐州之战”。

赵国和燕国听说楚国讨伐齐国后，也出兵到达齐国境内，后因道路不通，军队才没有继续前进，但楚、赵、燕三国都与齐国断绝了外交关系。面对三国的围攻，齐威王不得不派遣大臣到楚国请罪，又去游说赵、燕两国，三国这才停止攻打齐国。

春秋战国时期，越国曾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尤其是在越王勾践灭吴之后，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国因内部动荡导致衰落，为楚国吞并越国提供了机会。

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记载，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发兵歼灭了越国的主力军，杀越王无疆，随后占领了原吴国领土直至浙江地区。自此之后，越国陷入分裂状态，王室子弟分散在江南沿海一带，争相称王或自立为君，纷纷向楚国朝贡，以示臣服。越国的最终灭亡是在楚威王之后的楚怀王时期，公元前306年，楚怀王利用越国内部不稳定的机会，发兵攻越，最终灭掉了越国。越国的灭亡标志着楚国在南方地区的势力达到顶峰。

楚宣王、楚威王在其统治期间，励精图治，开疆拓土，使楚国在战国中期成为雄踞大江南北的泱泱大国。苏秦曾对楚威王说：“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阴之塞、郟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大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战国策·楚策》）苏秦对当时楚国国力的描述，虽然难免有夸大之嫌，但大体上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战国中期，楚宣、威二王攻城略地，西拓巴蜀，东收吴越，楚国的疆域达到了历史最大，一跃成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大国，跃居“战国七雄”（齐、楚、燕、赵、韩、魏、秦）中的强国，后世将这一时期称为“宣威盛世”。

翰墨荆楚⑫

岱宗夫如何 齊魯青未了
造化鍾神秀 陰陽割昏曉
會當凌絕頂 一覽眾山小

杜甫《望岳》 作者 黄文泉